

帝王
全传文从
Diwang



人杰女皇<武则天>

武周圣神皇帝千古第一女皇

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

武则天



Wuzetian
Emperor

珍藏版

李元秀 ◆ 编著

武则天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走进中国帝王那此亦真亦幻的谜团里，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；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；探索深藏在历史背后的隐秘世界。

ISBN 978-7-5402-2251-2

9 787540 222512 >

定价：498.00元（全十册）

武则天

人杰女皇



重新品读『王者之道』
看中国历史上的『帝王沉浮』

帝王
Diwang
从文金匱

武则天

人杰女皇〈武则天〉

武周圣神皇帝千古第一女皇

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

武则天



Wuzetian
Emperor

珍藏版

李元秀◆编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杰女皇——武则天/李元秀编著. —北京：
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10.3
(帝王全传文丛)
ISBN 978 - 7 - 5402 - 2251 - 2
I. 人… II. 李… III. 武则天 (624 ~ 705) - 传记
IV. K827 =4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1082 号

人杰女皇——武则天

编 著：李元秀

责任编辑：马明仁 满 鳌

封面设计：宋双成

出版发行：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

印 刷：北京海天润达明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：300 印张

字 数：5800 千字

版 次：2010 年 3 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5000 套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402 - 2251 - 2

定 价：498.00 元（全十册）



目 录

CONTENTS

■第一章 痴情媚娘选秀入宫



一	1
二	7
三	14
四	18
五	20
六	29

■第二章 二进宫脱胎换骨

一	41
二	47
三	55
四	59
五	69
六	79



■第三章 登后位夙愿得偿

一	88
二	97
三	106
四	114
五	123

■第四章 谋帝位废太子

一	133
二	142
三	151
四	161
五	170

■第五章 征高丽讨突厥

一	182
二	192
三	203
四	214
五	222
六	233



■第六章 临朝执政

一	243
二	252
三	262
四	272
五	282
六	290

■第七章 平谋反登皇位

一	302
二	308
三	315
四	323
五	328
六	332

■第八章 君临天下废黜太子

一	344
二	349
三	359
四	370
五	381



■第九章 女皇天下

一	394
二	404
三	414
四	423
五	441

■第十章 复太子武后立下无字碑

一	449
二	452
三	459
四	464
五	470





天



第一章 腹情媚娘选秀入宫

一

武士彟是武华的第四子，民间传说他是一个经营林业的木材商人；不过《攀龙台碑》却说他出生时就有帝王之像，文武兼备，人格如何高，学识如何优，才干如何好，这么多优点令他名震当朝，隋文帝屡加辟召，司徒杨雄、左仆射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宏、兵部尚书柳述等公卿大臣，争相向他抗礼求教。李峤奉旨写《攀龙台碑》之时已经是大周王朝的时代，此碑是女皇为颂扬其父武士彟——这时已追尊为“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”——人格功德之碑，后来唐朝史臣撰改国史之时，怀疑它和旧史有“过为褒词”和“虚美”之嫌，不足予以深究，不免对武士彟的事迹大加删除，以至也有过为削削之嫌。

其实，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，子弟们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。根据史书的记载，南、北朝以降，高门子弟穷哈哈或无仕者，所在多有，不算稀奇。青年时期的武士彟，经营木材很可能就是他的生意之一，所以史书说他“家富于材，颇好交结”。近世有些学者据此推论武士彟以鬻卖木材为业，是木材商人，值隋朝屡兴巨大土木工程，所以致富，因此判断他是投机善贾之流。经商致富之说，大抵可信。不过，投机是善贾之能事，好交结应酬也是商场的惯例，根据士彟的发迹事迹看，他的确是能观时通变之人，这也正是他的优势所在，使他能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。

武士彟经商致富与隋炀帝即位后大兴土木一事建设有关，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营建洛阳为东京。大业元年（605）修建东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设，遂由尚书令杨素、纳言杨达两位宰相分别担任营建的正、副使、副使——杨达后来即是武曌的外祖父。大约曌之父武士彟贩卖木材进入东京，利用关系与财富，常与权贵交结，一时轰动当朝。其间，他曾招致杨素的猜忌，想构以祸端，幸亏他经商的优点适时发挥作用，因为交结广、神通大，得到杨雄、牛宏等权贵的营护而免于祸，从此深自隐匿，以求自保。无独有偶，后来女皇的情夫张易之兄弟，也曾利用他们的权力贩卖木材及其他买卖，为时人所侧目与批评，给女皇带来了危机。

杨素向来负冒财货，营求产业，在东、西二京和诸方都会处，置有物业以千百数，素为时议所鄙。武士彟因为经商应酬而得罪了杨素，应有可能。总之，武士彟曾经得罪杨素而逃隐，极可能是一个事实，因为女皇革命之后，曾下制禁锢杨素及

其兄弟的子孙，不准他们担任京官和侍卫，或许与此事有关。

武士彟逃隐后开始注意局势的变化，及至隋炀帝大业七年（611）对高丽用兵失败后，国内乱局开始扩大，反隋起义逐渐蜂起。在这种环境气氛之下，武士彟遂想到要出山，决定往事功方面发展。不论他的真正动机究竟如何，这时炀帝实施广募骁勇、扫地为兵的政策，武士彟参与隋军，可见他是有志从军立功，以求仕宦的。

武士彟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资历，出山后当上了鹰扬府队正。队正统率五十人，是府兵制的最低常制长官。《攀龙台碑》对武士彟在隋末的军事表现着墨极重，用以表彰父亲的军功，其目的是通过颂扬先人的积德累功，作为武周早有天命的论述根据，遂使此碑所述有过为褒词和虚美伪冒之事。碑志在中国素来是用以谀美死人的，只要不过分相信，也就无伤大雅。

鹰扬府队正只是一个小军官，而太原留守李渊则系出陇西李氏，是今上（隋炀帝）的表弟，身份官爵均高，武士彟怎样结交上他，以致成为唐朝开国功臣？

根据《攀龙台碑》的说法，土彟要出山时，诸兄耳闻李密——当时反隋群雄之最有实力者之一名，乃劝他前去投奔。“李密虽有才气，未能经远，欲图功业，终恐无成”，土彟告诉他们。显然他的出山不是要自立山头，而是要投靠明主，以“图功业”。恰逢此时（大业十一年，615年），李渊奉诏往山西讨捕起事人民，安抚地方。他行军于汾、晋之间，休止于土彟之家，因蒙土彟招待，乃得以结交。至十三年（617），李渊奉诏坐镇太原为留守，于是引用土彟为行军司铠，成为留守府主管军事装备的幕僚。因此后来攻入长安，他就顺理成章地官拜库部郎，掌控全国的武器军备设施。

土彟虽为留守李渊所引用，却是副留守王威之党，不是李渊的心膂之托。武士彟观察李渊，认为此人“雄杰简易，聪明神武，此可从事矣”，于是攀附不遗余力；李渊也常往武宅“乐饮经宿，恩情逾重”。长官与部属之间有信任和默契，有游乐和享受，应是常有之事；只是土彟与李渊两人身份地位悬殊，结交也没多少时间，关系却如此快速的发展，应是土彟刻意奉迎的结果，因此后来李渊对武士彟说，“尝礼我，故酬汝以官”，正是指此而言。这时的李渊对武士彟来说可能只是可居的奇货，全心投资以期日后获得巨大的报酬。反之，李渊一方面因为得人款待，另一方面又鉴于他曾是成功的商人，想借用他的经营专才以协助处理军事装备，所以也就引用土彟为行军司铠。事实上，李渊在太原广结豪杰，历史记载当乡长的晋阳（即太原）富人刘世龙就曾因人引见于他，李渊“虽知其细微亦接待之，以招客”。

由于武士彟原非李渊的心膂之托，所以李渊没有让他参与起兵及进攻关中的任何重大决策。不过，武士彟对大唐的“太原起义”却有很大的贡献。

大业十三年，李渊鉴于群雄争霸之局已成，隋室终不可挽救，于是也想策马参与逐鹿。犹豫之间，一时不能决定。武士彟某晚夜行，听到空中“有称唐公（李渊）为天子者”；又梦到“从高祖（李渊）乘马登天，俱以手扪日月”，于是列状告诉李渊。这事虽事涉迷信，但在相信天命的当时，无疑是劝李渊起义，能够增强



其信心，所以“高祖大欢，益以自负”。另外又呈献所写兵书给李渊，等于教李渊用兵作战。李渊请他率勿多言，许以将来成功之后，“当同富贵耳”。

此外，当李渊秘密进行起兵部署时，武士彟还有以下两件功绩。

第一件是当李渊以另一起事集团刘武周进据汾阳宫为借口，下旨二郎李世民和刘文静、长孙顺德、刘弘基等各募兵集结之时，副留守王威、高君雅对此怀疑。尤其因长孙顺德、刘弘基二人原是逃兵，故欲予以逮捕审判。武士彟劝告两位副留守，说二人是唐公之客，逮捕审判他们则必与唐公大起纷争，使王威等不敢行动。其次是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建议王威等审按募兵的状况，士彟又劝止他说：“讨捕兵马的兵权总隶于唐公，王威、高君雅等不过仅是寄主罢了，他们又能怎样？”所以田德平也中止了行动。这两件事的摆平，使李渊能顺利进行募兵和集结，寻即举兵起事。

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，逮斩王威和高君雅，建大将军府，任士彟为铠曹参军。接着随军攻取关中，期间以功拜寿阳县开国公，食邑一千户；从平京师，迁光禄大夫，赐宅一区于长安。同年十一月，李渊扶立隋恭帝后，又录前后功效改封为义原郡开国公，增邑一千户。第二年——隋恭帝义宁二年，唐武德元年（618）——五月，炀帝死讯传来，李渊废恭帝自立，开建唐朝，此即武德皇帝，后来的唐高祖。武士彟不久之后被任为库部郎，赐以“太原元谋勋效功臣”衔。至武德三年更迁拜工部尚书，跻身“当世勋贵”之列。不仅如此，武德皇帝除了兑现“当同富贵”的诺言之外，为了感谢当年受到武士彟的盛待，更另封其两兄为郡公，声言“欲使卿一门三公”云云。

唐朝史臣说武士彟“首参起义，例封功臣，无戡难之劳，有因人之迹”。也就是说他只是因为从龙首义，故依照惯例封为功臣而已，这评价就武士彟以上所说的表现来说，显然甚不公平。纵使不论武士彟在李渊起兵前夕所立的功绩，单从他在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的确名列于少数幕僚的名单中，一直为李渊管理和供应军备之事来看，显然也是极为称职的，因此也就不能说他当时不重要。如果缺少他在军备后勤的有效策划和支持，李渊的部队能如此顺利进攻关中吗？中国人论战一向着重战场表现，“戡难之劳”指的是指挥镇定的统帅和冲锋陷阵的将士，后勤支持常遭忽视，就如同看打球只注视前锋进攻一样，不知有效的后勤支持，也常是取胜的关键。武士彟胜任铠曹参军之职，可以从李渊平定京师后，即任用他为兵部、库部郎一职看得出来，三年后升迁他为工部尚书，应当也与借重此才干有关。就是说李渊一直借重武士彟的经营管理长才，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开国功臣的原因之一。

武士彟从武德三年至八年左右担任工部尚书，中间曾因参与令典的编修，因此晋爵为从一品的应国公。唐初常例上常用武人为都督、刺史，是则位为尚书、曾任军将的武士彟，外放为都督而出掌方面，应该是早晚的事。

隋末占有淮南地区的是杜伏威、辅公祏集团，武德二年（619）杜伏威请降入朝，所部由辅公祏统率。公祏于武德六年（623）八月反唐，武德皇帝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行军元帅，李靖为副，率领李勣等七总管往讨，至第二年三月平定，遂授孝

恭为东南行台左仆射，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。其年行台废，孝恭转为扬州大都督，李靖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丹阳连罹兵寇，百姓凋敝，李靖平定之，吴、楚以安。不过，寻因突厥入侵，李靖于武德八年（625）八月改任安州都督，奉旨率军北上抵抗，遗缺由武士彟接任。士彟在八月以后以权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的官衔，赴任接替李靖。所谓“权检校”即是暂时代理的意思，《攀龙台碑》说皇帝约武士彟“期以半年”，即是如此。不料士彟此去，就再也没有回任中央的机会。

士彟的留任扬州，和他在任上的成绩有关，碑文说他“降北海之渠，未逾期月；尽南山之盗，讵假旬时。然后商旅安行，农桑野次，化被三吴之俗，威行百越之境”，使管区日渐安定、经济日渐恢复。因此，当武德九年半年约期届满之时，调返中央的不是武士彟而是李孝恭，扬州大都督则由襄邑郡王李神通接任。原因是因为有当地“父老数百人，诣阙上奏，乞更留一年”，所以玺书褒奖，让士彟留任。同年下半年，武士彟协助李神通迁移州府及居民自丹阳迁于江北，使广陵从此成为州治，得以专扬州之名，这亦武士彟的一种政绩。士彟的经营长才，也应由此作观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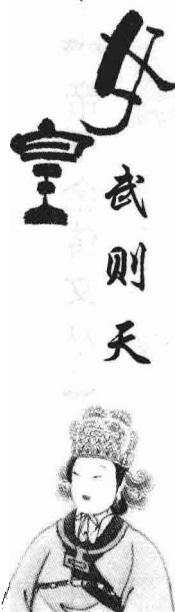
就在同一年——武德九年（626）六月，天策上将·尚书令·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，逼其父皇交出政权。至八月，世民以皇太子身份即位，是为唐太宗。世民以太子执政期间，中枢高层换了一批人，主要由秦府人马担任要职。所以此时征召武士彟入朝，对他仅是止于宠赐频繁，事以殊礼，以安慰父皇旧部罢了；不久却另以捍卫战略要地的理由，将他改授为豫州都督。

次年——贞观元年（627）十二月，因利州都督李孝常谋反被杀，督区政情不稳，乃改授武士彟为利州都督。士彟赴任后迅速将余党抚平，故又得玺书褒美，增邑五百户。也就是说，贞观皇帝实际上也是看重他的经营长才。贞观五年（631）底，士彟以利州朝集使的身份回京述职，并在十二月领衔上奏，奏请封禅泰山而不获允许，可见他在政坛依然相当活跃。武士彟的奏请虽然不获许，不料却在三十五后，由他的二女儿——大唐天后——推动并完成了此盛举，真是天意！是月稍后，武士彟改任为荆州都督，直至九年（635）五月，太上皇（李渊）死讯传至荆府，武士彟悲恸万分，乃吐血而死。士彟死状驰奏朝廷，贞观皇帝闻之，哀悼说：“可谓忠孝之士！”乃追赠为礼部尚书，谥号为“定”。

武德九年秦王世民兵变逆父，改朝换代之际，秦府班底当道，这是他不能重任中央官的原因。不过，事有焉知非福者，他一再外放为都督，而且都是有危机或战略之地，所以才有机会施展他的经营管理之才，大抵以维持社会治安为主，恢复经济为辅，政绩不错。依照唐朝章法：“大虑安民曰定，安民法古曰定，追补前过曰定，安民大虑曰定，纯行不爽曰定。”可见士彟因为历任都督，有安民之功，因此被有司建议谥为定。如果不因人废言，武士彟不失为一个干才。他的发迹虽然颇富传奇性，但是绝非仅因从龙首义而例封功臣，一个庸俗的马屁精而已。

贞观皇帝对于武士彟并无特殊的厚待，赠官不是最高级的三公官，也不列他人“凌烟阁功臣”名单之内。武士彟后来多次被追尊，武士彟与其女武曌被贞观皇帝

人杰
女武则天



之子后来的唐高宗宠爱有关。追赠并州都督是在曌为昭仪之时，追赠司空、司徒周国定公是在曌为皇后之后。及至武后与高宗合称“二圣”，更被迫奉为太原郡王，食邑五千户，以文水县三百户充奉陵邑，置令、丞以下诸官，他的庙讳和祖先名讳皆严禁他人冒犯。武后以太后身份临朝以后，又追崇其父为魏王，食邑一万户。

降至大周革命前夕，更追尊为忠孝太皇。革命后，于天授元年（690）尊为孝明高皇帝，庙号太祖，陵墓称为昊陵，圣历二年（699）改昊陵署为攀龙台，即是《攀龙台碑》的由来。

武曌生母应国夫人杨氏，名讳或许是“真”或“贞”，是武士彟的继室。

士彟的原配是相里氏——可能是汾阳地区门第不高的胡人之后，为他生了四个儿子。武德三年以后，士彟统领并钺军，官拜工部尚书，跻身新贵，照顾一家从此可以同享富贵荣华；可惜天公不作美，两儿相继病死，士彟的心情自是悲痛。当他们病重之时，武士彟因为军职在身，无暇照料，甚至连前往探问也没有，仍然勉力从公，没有声张。

一年之后，相里氏也因病亡故，中年丧偶，武士彟的心情更是悲恸万分。由于武士彟这时的爵位是义原郡开国公，故相里氏的身份即是外命妇，她的死讯不得不奏报朝廷。听了所司启奏，武德皇帝深受感动，下敕褒扬说：“此人忠节有余，上年儿夭，今日妇亡，相去非遥，未尝言及，遗身徇国，举无与比！”

相里氏死后，士彟带着两个儿子元庆、元爽螺居。士彟在京有宅，前后有不少封赐，兄弟及宗人在京做官者也常有来往，原本也不为生活发愁。但是，中国经过南、北朝的长期分裂，南、北的社会文化明显出现了差异：原来从商鞅改革以来，秦汉流行小家庭制度，晋朝以降汉人避难渡江，故南方保留了此风习，仍然以小家庭居多，即使聚族而居也是各自异炊，妇女极少步出闺庭，交际往来也少，在家以管中馈为主；北方则相反，北方因为民族之间长期互相征战，汉族是被征服者，所以他们常是聚族谋生和自卫，以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为盛，文水武氏就是其中之例。所以，北方的社会风俗专以主妇持门户，家庭里主妇的地位极为重要，她们争讼曲直，造请奉迎，车乘填街衢，绮罗盈府寺，代子求官，为夫诉屈，人事多由内政，社会生活相当活跃。南朝一个名人颜之推来到北方，就惊讶于这种差异，认为是受到鲜卑遗风的影响，将之写在他的著作《颜氏家训》里。如今武士彟丧失主妇，对他的家庭乃至家族事务就因失去重心而产生不便。武德皇帝对这位功臣的状况极为关注。

士彟这时正以工部尚书参与撰改令典。此时国家所修的令典应当是《武德律》和《武德令》，《令》的部分于武德七年（624）三月先定，至四月《律》、《令》全部完成，遂将此《武德律令》——唐朝第一部法典正式向全国颁布。所谓《律》，就是一般人所知的法律，《令》则是政府组织法。唐朝后来所订的《律令》，皆以此为因袭的源头。唐朝《律令》属大陆法系，对东亚的大唐文化圈极有影响。这是唐朝首次的重大修撰工程，依例，重大修撰之后定有晋爵或物质等赏赐，故武士彟得以晋爵为应国公。士彟可能仅参修《令》的部分，所以他的晋爵最晚不至于

四月。这时，武德皇帝为他物色了一个婚姻对象——高门大族宏农杨氏之女。

杨氏在唐革命之后被迫奉为“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”，女皇之侄武三思，奉制写有《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》，又称为《望风台碑》。此碑说杨氏是宏农仙掌人，及是周朝唐叔虞之后。垂拱元年（685），为忌仍为太后的女皇祖（武华）讳，将当时名为华州的宏农郡改为太州，又改太州的华阴县为仙掌县，亦即杨氏实是华阴县人。

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是一个门第社会，高门大姓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资源和政治优势。当时全国的最大世族共有：因避晋朝战乱而渡过长江称为“侨姓”的，以（琅琊）王、谢、袁、萧四姓为最大；原籍在江南称为“吴姓”的，则以朱、张、顾、陆四姓为最大。在北方，汉人高门都称为“郡姓”，山东以（太原）王、崔、卢、李、郑五姓为最大，关中则以韦、裴、柳、薛、杨、杜六姓为最大。至于源出代北鲜卑集团的大姓都称为“虏姓”，以元、长孙、宇文、于、陆、源、窦等七姓为最大。不论怎样，宏农杨氏是关中六大郡姓之一，门第之高连唐朝王室陇西李氏也不能比。

宏农杨氏由汉朝就兴起，至南、北朝末出现了杨坚，建立隋朝，统一中国，即隋文帝。女皇之母杨氏，和杨隋王室同宗不同房，她系出宏农杨氏观王房。所谓观王房，是指隋朝“四贵”之一的司徒·雍州牧·观王杨雄一房而言。杨雄是当时正炙热的权贵，其弟杨达也接连上任尚书、纳言（侍中），并曾以营东都副监官职和尚书令杨素主持洛阳宫阙的建设，封为遂宁公。杨氏即是杨达的女儿。杨雄和杨达兄弟两人贵为隋朝宰相，降至唐朝，杨雄之子杨恭仁是武德皇帝的宰相，另一子杨师道则是贞观皇帝的宰相，他们的侄子杨执柔也因女皇有“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主宰”之意而拜相，一个外孙女——就是后来参与封禅大典而行终献礼的越国太妃燕氏——则是贞观皇帝的妃子，家世十分显赫。

此时是门第社会，故武德皇帝即曾以开国集团门第之高贵为荣，认为他的开国集团皆系出高门世族，比汉朝开国集团的出身卑微越很多。在门第观念如此浓重的时代，婚姻讲求门当户对，若非“卖婚”，文水武氏如何攀得上宏农杨氏这桩婚姻？因此有人认为武士彟当年以贩卖木材之故，所以有机会认识负责营建工程及东京建设的杨达。及至达死隋亡，而士彟变成唐朝新贵，遂娶杨达之女为妻。此说仅是猜测之词。因为武士彟是否曾与杨达认识，无证可考；而根据《攀龙台碑》和《望风台碑》，武士彟与杨氏的结婚，事在士彟进封应国公之后，且由武德皇帝亲自撮合。

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：由于士彟先缺中闹，武德皇帝亲为这位功臣搭线，知道杨氏尚待字闺中，于是就告诉士彟说：“隋纳言遂宁公杨达，才为英杰，地则膏腴，今有女贤明，可以辅德，秦晋之匹不能加也！”于是特降纶言，俾成婚对。武德皇帝并且亲自为士彟的主婚人，另遣桂阳公主做女家的婚主，礼娉所需，均由官方供给。婚礼完毕，马上依班例拜杨氏为应国夫人。桂阳公主是武德皇帝之女，也是杨氏堂兄弟杨师道之妻。所以，他们的婚姻绝非山东衰落门第的买卖婚姻。士彟也因

人杰

女

武则天

天



这桩婚姻的缘故，与李唐王室或多或少也沾上了一些亲戚关系。

士彟原本家富于财，如果《攀龙台碑》所述是真的，则他做客以来前后赏赐甚多，封寿阳县开国公时食邑一千户，改封义原郡开国公时增邑一千户，武德元年又赐田三百顷、奴婢三百人，别食实封五百户，进封应国公时又加实封八百户，从平京师时曾赐宅一区，表示在长安有住宅，即使后来外放为都督，回京稟报政情时，也不必像其他朝集使般“赁房与商人杂居”。也就是说，武士彟除了门第条件之外，财富和功名这两条件均十分优秀，所以皇帝才为他主婚，相里氏来不及享受的从一品夫人和荣华富贵，现在皆由杨氏来坐享。后来相里氏所遗二子对此后母不礼，很可能这是原因之一。

二

根据《攀龙台碑》，说武士彟死于贞观九年（635），享年五十九岁。以此推算，士彟生于北周建德六年（577），武德新律令修成时（624）是四十八岁。至于杨氏，根据《望风台碑》说死于咸亨元年（670）八月二月，春秋九十有二。由此推算，她生于北周宣政二年（579），比士彟小两岁，等到士彟四十八岁为应国公后，与她结婚之时，她已经四十六岁。唐朝女性一般在十三至十八岁之间结婚，而以十五岁最多，是则杨氏嫁给士彟之时，早已过了适婚年龄。为什么会发生情况？

根据《望风台碑》的说法，杨氏出身高贵，对女红并不重视，而却明诗习礼、阅史披图，颇能属文，其父杨达许为“隆家之女”。或许因为她的门第过高，或佛教信仰，而又教育良好的关系，故不易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及至隋炀帝大业八年（612），杨雄、杨达先后死于远征高丽的途中，此时她已经三十四岁。碑文说她哀于父丧，希望凭托佛教，“永奉严亲，长栖雅志”，表示已索性不愿婚嫁，祈福父灵。若不是皇帝撮合，杨氏恐怕即如此度过一生，历史上遂也就没有武则天其人其事了。

两人婚后生活情况良好，杨氏显然是贤内助，甚至武士彟的仕宦顺畅，也与杨氏“实资阴助”有关。贞观九年武士彟死于荆州都督任上，遗嘱归葬文水，家人乃将他送回故乡安葬。都督是三品职事官，唐朝旧制：三品官丧礼均给卤簿，墓前树立一定高度的碑碣及一定数目的石人石兽，而由鸿胪丞监护丧事。武士彟由于是归葬，故宫造灵輦送至故乡，坟墓则因山而建，穿足容棺，殓以时服，丧费由官方提供。丧礼举行时，委由本州大都督李世绩监护，朝廷另遣郎中一人驰驿前去吊祭。依丧事的规格看，表示武家虽然富有，但依然十分节约。

杨氏先后为士彟生了三个女儿：长女后来嫁给越王府功曹贺兰安石，季女嫁给郭孝慎，豎则是次女。及至士彟死，杨氏时年五十七岁，悲痛欲绝，再度“方祈净业，敬托良缘。凭慧炬于幽途，舣慈舟于觉海。于是心持宝偈，手写金言，……将佛日而长悬，共慈灯而不灭”，愿长伴夫墓；但是“特以圣上（武则天）年居膝

下，爱切掌中；理藉劬劳，方资顾复”，所以才打消主意。根据《望风台碑》此说法，杨氏是因为墨尚小，需要母亲的照顾，所以才转变凭托佛教、长伴夫墓的念头的。此年墨已十一岁。

及至永徽六年（655）武墨正位六宫，其年十一月杨氏被册为正一品的代国夫人，后来又转拜荣国夫人，位在王公母妻之上。死时赠鲁国太夫人，谥曰忠烈，寻又下制赠太原郡王妃。武后临朝，追奉为魏王妃，改其咸阳园陵寝曰顺义陵。革命前期追尊为忠孝太后，革命后又追尊为孝明高皇后，陵曰顺陵。后来又添“无上”二字，改顺陵曰望风台，故其碑又称为《望风台碑》。

武德七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古老的长安城人烟稀少。此时，李渊的心腹故旧、官居工部尚书、位尊应国公的武士彟，府第里灯火通明，丫鬟们一个个屏着气息、迈着匆匆步履来回穿梭忙碌着。年近五十的武士彟正在厅堂里踱来踱去，内室阵阵女人的呻吟传到他的耳朵里，让他有点焦躁不安。过了好久，他终于听到了“哇哇”的婴儿啼哭。

“生了，生了，恭喜大人，夫人生了位千金小姐。”一个丫鬟嚷着向尚书道喜。

“好好侍候夫人！”武士彟说话有些气喘，这毛病是当年在严寒的冬天随高祖征战的时候落下的。他嘱托了一声，忙趋进内室去看望夫人和新生儿。武士彟对小他两岁的后妻杨氏宠爱有加。

杨氏此时正疲惫地躺在床上，一见老爷进来，想支撑着坐起来。武士彟忙扶住夫人的肩膀，说：“快躺下，夫人身体虚弱，小心别冻着。”此时养娘早已把婴儿抱过来给老爷瞧。只见女儿大声啼哭，小脚丫使劲地蹬踢着，健康而有活力。

“夫人你看，这又高又直的鼻梁长得像夫人啦。”武士彟乐呵呵的，老年得女，心中十分欢畅。杨氏没搭话，眼睛里却泛起两行眼泪。她对女儿的出世并不怎么高兴，她想生个儿子。武士彟有了四个子女。前妻相里氏生四子，两子夭亡，元庆、元爽已长大成人。相里氏病亡后，武士彟由高祖李渊做媒并令桂阳公主主婚，娶前朝隋炀帝堂弟、曾任纳言的杨达之女为续弦。杨氏入武家后，生有一女，已四岁，即是后来被高宗所封的韩国夫人。由于武家族人轻视杨氏家道中落，丈夫前妻之子元庆、元爽不服管教，杨氏很期望给武家生个儿子，将来可以继承父爵，自己老了有个靠山。但命运偏与她作对，这一胎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因此不怎么欢喜。武士彟理解夫人的心情，劝慰一番，杨氏的心情好了一些。

武家的二女儿出生的这一天，长安城并没有出现一点奇征异兆，只是天气比以前寒冷。次日早朝，武士彟添女的消息也并没有引起六部同僚和下属们过多的兴趣，大家只是敷衍称贺一番，向武尚书讨汤饼宴请。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唐室的一场早晚要来的风暴上去了。这就是高祖嫡妻的几个虎儿龙子勾心斗角的事。对朝廷官员们来说，这远非皇室家事，而是关系到每个人一生命运的大事。所以，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他们都很敏感，哪会有心于武家的柔弱女婴的诞生。如果他们有预测术的话，也许就不会这样等闲视之了。

杨氏不怎么欢迎出生的女儿，因此也没有给她取名，顺着大女儿的称呼“大



因”，就把这个女儿叫做二因。后来此女入宫，得太宗赐名“媚娘”，因此才有了“武媚娘”的称呼。她死后被尊为“则天大圣皇帝”和“则天大圣皇后”，因此史学家常常以尊号作为她的名字，称她为“武则天”，这成为最常用的一个名字。另外，她还自创名字为“曌”，读音为“照”，取“日月悬空，普照大地”之深义，因此也叫“武曌”。但这一名字反而没有武则天这个名字那样被普遍使用。

武则天出生后仅几个月，其父武士彟就被外调扬州任官。杨氏母女则留居长安平康坊府邸。在此，武则天长到四岁，才又随父母赴利州。

隋唐换代分际，是男人们野心最易于骚动的时机，龙虎之才信手拈来。武士彟在其中是平常之人，本不值得特书一番。如果不是女儿后来当了皇帝，他死后得以追封皇帝，唐代的史书顶多把他一笔带过。魏晋以来的风气，在政治上的地位尊卑主要取决于门第。出身于官僚世家大族，凭门第就可以平步青云，位至公卿，历代以来形成了“公门有公，卿门有卿”的恶性循环。出身低微的地主和商人被称为寒门庶族，其子弟不论才德高下，年及而立也只能试做小吏，升迁像爬梯一样难。或因军功得到显位，依然很自卑，想方设法攀附高门。隋唐以降，虽然士族势力已逐步衰落，庶门寒士上升的渠道增多，但门第之风仍很浓烈。武士彟就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寒士。

他原籍并州文水县（今山西文水县），祖上是农民，到父辈才开始经营点小买卖。武士彟有两位兄长，即武士稜、武士逸。兄弟三人年少时没有读多少诗书，武士稜务农，武士逸在隋府军中当一个士兵。而武士彟则忙于木材的购进卖出。也是他幸运发迹，隋文帝晚年渐趋骄奢，大兴土木，木材生意很旺盛。聪明勤奋的武士彟有一副让人信赖的憨厚农民的外表，又有商场上练就的能说会道的本事。他周旋于低层工程监督官员之间，做了不少木材生意，家境逐渐富足起来。商人虽为“四民”（士、农、工、商）之末，地位虽然低下，但实际上与平头百姓比来却大不一样。有了钱可以买田置地，结交权贵，成为地主官僚，地位就可上升为“四民”之首。武士彟就是这样，史书上说他“家富于财，颇好交结”，娶了一位退职将军的女儿相里氏为妻，又得岳父推荐，当了个鹰扬府队正（隋时府军中的小官，约统领50人）。

隋炀帝大业元年（公元589年），炀帝堂弟、燧宁公杨达受命与宰相杨素、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。武士彟得此消息，备厚礼托关系，侥幸见到杨达。没想到杨达对他的言谈举止颇有兴趣，不仅谈成了一笔大生意，而且还引为宾朋，请他时常往来。在杨达府邸，他又结交了时任殿前少监、卫尉少卿的李渊，即唐高祖。此人出身于关陇世家，祖上为北周八柱国之一，封唐国公；隋承周祚，其父晒又在隋文帝驾下为臣，袭封唐公。李渊的生母与文帝的独孤后为同胞姊妹，因此李渊就是文帝姨侄。他长得有灵气，很为文帝所喜欢，自幼养在宫中。晒去世后，李渊袭父爵，历任谯、陇刺史。隋炀帝登基后，李渊奉诏任殿前少监、卫尉少卿。炀帝征辽，命李渊督运兵粮。行军至太原，经杨达引见，李渊认识了憨态可掬、出手大方的武士彟，对他颇有印象，就屈尊到他家住了一宿。武士彟有此奇遇，自然千方百计地讨